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历史经验研究

——咨询报告集萃

(2017)

王炳林 赵军◎主编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历史经验研究

——咨询报告集萃

(2017)

王炳林 赵军◎主编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刘智宏 苏向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研究：咨询报告集萃·2017 / 王炳林，赵军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01 - 017880 - 6

I . ①中… II . ①王… ②赵… III.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2017
IV.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9221 号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研究——咨询报告集萃（2017）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IGUOLIZHENG LISHI JINGYAN YANJIU
——ZIXUN BAOGAO JICUI (2017)

王炳林 赵军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880 - 6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史学习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2013年7月，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在复旦大学、嘉兴学院、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设立8个“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从多方面开展中共党史、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教育宣传工作，推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8卷本）、《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发展报告（2016）》、《资政育人：高校党史教育论丛（2015、2016）》等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搭建了以“高校党史教育论坛”为代表的学术交流平台。研究中心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探索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精神资源。为深入研究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学习和借鉴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艺术，从党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咨询报告研究撰写工作，专门举办咨询报告写作研究班，通过集中专题授课、优秀经验分享等工作，

式，提高咨询报告研究撰写水平。目前，8个高校研究中心均推出了主题集中、特色鲜明的系列咨询报告，报告质量和水平正不断提升。其中，复旦大学研究中心的《治国理政》系列咨询报告得到中共中央和教育部、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领导的高度认可。

为更好地发挥上述咨询报告的作用，我们从8个高校研究中心撰写的咨询报告中精选出43篇，汇编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研究——咨询报告集萃（2017）》，供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参考。

编 者

2017年6月

目 录

| | |
|---------------------------------|-------|
| 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1) |
| 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11) |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统战工作的经验 | (17) |
| 从红四军七大前后的纷争看如何妥善处理领导之间的争论 | (29) |
| 苏区时期党的巡视制度建设及其历史启示 | (43) |
| 增强群众政治认同的两条历史经验 | (48) |
| 中央苏区社会保障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53) |
| 苏区戏剧运动的经验及历史启示 | (65) |
| 遵义会议对当前改革的启示：民主集中制的胜利 | (70) |
| 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呵护党的生命 | (77) |
| ——以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为案例 | |
| 遵义会议精神与新时期党员干部队伍理想信念建设 | (87) |
| 多重超越铸就“中流砥柱” | (95) |
|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 | |
| 巩固与扩大：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问题研究 | (107) |
| 延安时期党建设了“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 (116) |
| 重温《反对自由主义》，营造健康政治生态 | (124) |
| 延安时期党的铁的纪律与严的规矩 | (130) |
| “窑洞对”：鞭策与警示 | (138) |
| 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 (148) |
| 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 (154) |
| 《新华日报》坚守党报原则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 (168) |

| | |
|-------------------------------|-------|
| 农民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 | (175) |
| ——以中国共产党在土改中的“诉苦”运动为案例 | |
| 主动因应敌对势力破坏 织密国家安全防控网络 | (183) |
| ——以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经验为视角 | |
| “两个务必”理论成果亟待转化为实践要求 | (192) |
|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199) |
| ——基于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规矩建设的经验 | |
| “西柏坡规矩”的现实启示 | (207) |
| 用合国情顺民意的方针政策开拓发展新境界 | (215) |
| ——西柏坡时期党制定城市接管方针政策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 |
| 解放军“不入民宅”产生的效应及其历史启示 | (222) |
| 怎样做到既坚决反腐又不损害党的形象 | (231) |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三反”斗争的历史经验 | |
|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 (238) |
| 深化毛泽东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 | (245) |
| 毛泽东发展钢铁工业的现实启示 | (249) |
| 邓小平晚年对维护党中央领导核心的三点要求及其启示 | (256) |
| 习近平加强中央政治局建设思想的五大看点 | (262) |
| 用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统领高校文艺教学与研究 | (269) |
|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思考 | |
| 粮食安全“永远在路上” | (279) |
| 加快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正分配 | (285) |
| 增强文化自信三策 | (288) |
|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建设的宝贵经验及历史启示 | (294) |
|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教育的必要性 | (301) |
| 关于新形势下增强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思考与对策建议 | (307) |
| 关于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社会服务功能建设的思考和对策 | |
| 建议 | (311) |
| 加强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 (317) |
| 后记 | (322) |

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编者按]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文章，首次公开提出“红船精神”概念，并对“红船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论述，认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之源。九十多年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共创建前后，中国共产党人时刻彰显“红船精神”。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在中共早期宣传工作方面，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宣传内容主题鲜明、有针对性，且贴近群众、贴近现实；宣传方式多种多样，注重实效、时效，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对当前我党自身建设和宣传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回答了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民主革命长期未能弄清的革命对象、革命动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等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如何把这一理念传播于社会,中共早期宣传工作者们为此作了大量的努力。

一、中共早期宣传工作面临的困难

一是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封建意识浓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广大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长期浸淫于传统文化思想,习惯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迷信各种民间的鬼怪神。

二是政治环境极其恶劣。当时,列强及军阀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严厉禁止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随时有被捕和被杀头之险,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品随时有被没收和查封的可能。如1921年年底,在反对华盛顿太平洋会议的宣传运动中,长沙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被杀。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因散布所谓“过激言论”,多次被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的《劳动周刊》,出版至第41期便被封禁,有的报刊甚至刚刚创刊便遭查禁,能够持续办下去的几乎没有。

三是经验不足。中共早期成员大都是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们擅长写一些深奥的理论文章,对于如何到群众中去作广泛的宣传动员缺乏经验。《安源地方报告》说:“办有六十学校,子弟学校比较好,工人补习班因教员难得适合于工人心理之人才,成绩转劣。”^①

四是财力匮乏。有资料显示,中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支持,自筹经费的能力十分有限。以上海为例,“合计每月可收党费130元,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仅30元”^②。党的领导人全都不领工资,陈独秀悉数捐出自己的稿费,但这对于一个新建党的活动开支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二、中共早期宣传工作采取的策略

中共早期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军队,其影响社会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宣传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② 王建柱:《党费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解放日报》2017年1月16日。

鼓动来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①中共的发展，从共产主义小组的萌芽到中共一大的召开，从开始不引人注意的小党派发展到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党组织，正是在大力宣传的过程中逐步成长壮大的。在这一过程中，为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在宣传工作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积极创办报纸杂志，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共创建后，除继续办好《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外，又编辑出版一些新的宣传刊物。如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中华妇女界联合会主办的《妇女声》，毛泽东以湖南自修大学名义创办的《新时代》，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普及性的工人报刊，主要有《劳动周刊》《工人周刊》《劳动周报》（广州、武汉）等。

以中共早期报刊作为主要阵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了一系列论战。这些论战帮助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同时促进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沿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大踏步地前进，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二）把唤醒民众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宗旨和目标

唤醒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参与意识，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是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宗旨和目标。尽管宣传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和曲折，但中共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和同盟者，仍然对宣传工作高度重视，努力唤醒国民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但“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指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使劳动者有阶级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7页。

^② 同上书，第548—549页。

的自觉”^①,把宣传工作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

鉴于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②在《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中央进一步强调在农村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工作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三大后真正开展了对农民的宣传,当时,毛泽东就号召大家“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③

(三)健全党的宣传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健全党宣组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央局便设有宣传委员,专职领导宣传工作。在各地尤其是工人比较集中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和安源等地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等各种形式的工人文化组织,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宣传,“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④。对此,中共四大决议指出:“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⑤

宣传活动形式多样。他们利用太平洋会议召开、奉直战争爆发等重大事件,广泛散发传单、小册子,深入分析形势,及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利用纪念日召开纪念会、散发纪念册,利用节庆日到公共场所散发传单、组织演说等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1页。

^② 同上书,第11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54页。

^⑤ 同上书,第374页。

形式开展宣传。发明了“飞行集会”宣传新形式(利用工人上下班比较集中的时间,在工厂门口迅速地向工人宣传国内的重大政治变化、外交事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宣言、每一个主张。当军警发现时,他们已经跑到另一家工厂门口开始宣传了)。还用大鼓、说书、讲故事等方式普及党的理论,并把各地工人的控诉有系统地加以整理公布等。这种贴近实际的宣传,使工人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接连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三、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经验

(一) 中共早期宣传工作处处彰显首创精神

先进中国人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存在主体复杂、传播范围狭窄、碎片化、学说曲解甚至立场不确定等局限性,在当时也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接触的“奢侈品”,还没有对刚刚萌动的工人运动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中国人并未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关注中国社会,更谈不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在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十月革命促使李大钊开始热烈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7月至1919年2月,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和赞颂十月革命。对于俄国的胜利,他高度评价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并且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中,他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第一次得到比较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陈独秀是中共早期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倡“民主”与“科学”,领导五四运动,促成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搭建了思想平台。1920年春,陈独秀完成了从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共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北京主要有李大钊、陈浦贤、陈启修等,上海主要有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此外还有杨匏安等人;传播的主要刊物,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广州《中华新报》等。

中共一大前,上海、北京等地的工人运动已初具规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于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对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之后又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以提高工人的觉悟,并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1920年11月后,相继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出版了工会刊物《机器工人》和《伙友》。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劳动音》周刊,随后又举办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出版了《工人周刊》杂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共一大后,党的工作重心在推动工人运动方面。1922年《先驱》发刊词中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

中共早期报刊编撰群体都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彻底的爱国者。他们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概,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邓中夏、萧楚女等是中共早期报刊编撰群体的代表。他们是集媒体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于一身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

中共早期报刊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有的放矢,力避空泛。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时提出,对工农大众的宣传,要学习工农的语言和思想,避免用工农不懂的学生腔,深挚的意思要用极浅显的语言来表明,才会得到民众的同情。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赵世炎等的文风,就是极好的代表。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分析的精神,言之有物,语言精练,代表了五四以来新文风的发展。

(二) 中共早期宣传工作始终坚守奋斗精神

共产主义理想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光辉的社会理想。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艾青说过:“即使我们只是一支蜡烛,也应该‘蜡炬成灰泪始干’;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即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没有理想就没有目标,没有信念就没有实现目标的动力,有了理想信念,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非一日之功,也不能一劳永逸。它只有在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坚信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必然性并立志献身于这一事业的基础上,不断经受各种磨难,抵制各种冲击和诱惑,历经艰难曲折乃至生死考验,才能铸就。

中共自诞生那天起,党就把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写入了自己的纲领。党的二大宣言鲜明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①。

宣传、组织最广大民众关切他们自身利益,并能为其根本利益奋斗,是中共报刊的基本宗旨。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多次阐述这一宗旨并付诸宣传实践。《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

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地报道事实,是中共报刊最主要的宣传方式。这和一切反动报刊畏惧真理、歪曲事实、造谣欺骗的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五四时期,恽代英主编武汉《学生》周刊时,就把“求真”作为对办报人的一项重要要求。他认为,报纸的力量不在报纸宣传的“故甚其词”,而在把“真相”给读者看而已。当人们惊讶于《中国青年》等革命报刊宣传效果的显著时,他列举了两大原因:一个是因为“中国今天一般青年在实际生活上需要革命”,一个是因为“我们说的是真话”。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提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一九二五)》(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赤光》对国家主义派机关报《先声》周刊的论战中，邓希贤（小平）有力地揭露《先声》“自造新闻”的伎俩。当论战胜利时，周恩来总结提出，从报刊宣传态度上说，这是《赤光》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态度反对《先声》造谣中伤的唯心论态度的胜利。

（三）中共早期宣传工作全面体现奉献精神

为了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共建党之初就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以此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党的一大召开之时，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

忠诚党的事业，立志献身大众利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研究、洞悉国内外政治时事；深入群众，勇于实践，不畏艰苦牺牲，是中共早期宣传工作者的基本品格。

中共早期的党报工作者，是记者、政论家，但首先是政治活动家。他们置身民主革命的前列，深入群众，反映实际；意志坚定，观察敏锐；才识宏通，艰苦卓绝，发扬光大了中国先哲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他们是真正为中国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治家与政论家结合的一代报人。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则是他们当中的突出代表。

正是由于近代中国选择了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以及理论与现实国情的巨大差别，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注定要为坚定理想而百折不挠地与不断动摇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倾向作斗争，从红船精神到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形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精神财富。

四、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启示

(一) 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往往都是集媒体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于一身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们不仅可以写作,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深入广大工农群众之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同时也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身边的人。

在今天,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也都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而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宣传者,不仅要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还必须及时了解、掌握和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积极引导广大群众理解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 对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要敢于“亮剑”

在建党前后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是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帮助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今天,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复杂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同样受到了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和挑战。对于这些冲击和挑战,我们必须敢于“亮剑”,揭穿这些披着各种伪装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坚定理想信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意识形态阵地战中,我们相信,革命的、实践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取得最终的全面的胜利。

(三) 宣传内容要文风朴实、有的放矢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时,提出对工农大众的宣传,要学习工农的语言和思想,避免用工农不懂的学生腔,深挚的意思要用极浅显的语言来表明,才会得到民众的同情。这也就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灌输过程中,一定要针对受众的特点,结合受众的实际,寻找理论原则与群众需要之间的契合点,用通俗易懂和形象生动的语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入耳、入脑、入心，并最终转化为群众自觉的行动指南。

(四) 宣传工作者必须对党忠诚、乐于奉献

恽代英在《怎样做一个宣传家》等文章中说，革命报刊宣传家不是一般的学者、文人，首先是一个信念坚定、忠于人民利益的革命者。他们对革命的主义和理论，要有充分的真正的明了，而且能够真正去实行主义，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要善于了解群众，联系群众。这就告诉我们，党的宣传工作者不同于一般同人办报和文人论政，而是党的集体的战斗队伍，有着明确的党报观念。忠诚于党的宣传事业，立志献身大众利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研究、洞悉国内外政治时事；深入群众，勇于实践，不畏艰苦牺牲，是党的宣传工作者的基本品格。而在现实中，一些理论宣传和党报新闻工作者，政治立场不坚定，不能明辨是非，以文谋私、大搞钱稿交易，不仅背离了宣传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更是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中共早期宣传工作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宣传内容的时效性、宣传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宣传管理的纪律性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处处彰显着“红船精神”。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党的建设和党的宣传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嘉兴学院研究中心：吕延勤、孙宝根)